

2201



重庆渝中区文史资料

政协重庆渝中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第8辑

重庆渝中区文史资料

第八集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市渝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十月**

《重庆渝中区文史资料》

第八辑

目 录

一、红岩精神代代传

1. 周恩来陪都轶事 魏仲云(1)
2. 吴玉章哭亡妻 魏仲云(7)
3. 黎明前倒下的战士 朱 俊(10)
4. 让红岩精神代代相传 罗达公(13)

二、军政

1. 保育战时受难儿童——抗日战争时期妇女界的一大创举 陆志轩(18)
2. 军统起用的两个外国人 张成信(28)
3. 踊跃参军勇敢参战——我与重庆大批学生参军出川
参战的经历和见闻 王辛佑(31)

三、工商经济

1. 历史航程的连结——卢国纪谈民生公司 伍志安(42)
2. 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陪都工商界对抗战作出
巨大贡献 龙明桥(48)
3. 重庆母城——渝中区市场沿革变迁 谢向全(52)
4. 回忆解放重庆接管银行的一段往事 邓林春(58)

四、文化教育

1. 双文魁院子沧桑记 李世庆(63)
2. 男儿少壮读书报国树业有专攻——巴县中学简介
..... 江国樑(69)
3.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重庆 欧阳昭华(78)
4. 抗战时期张家花园的星期讲座 欧阳昭华(89)

五、文学·艺术·人物

1. 夏衍与“二流堂” 万 声(93)
2. 胡风一家抗战时期旅渝简记 杨 筱(99)
3. 京剧“厉家班” 厉慧森(106)
4. 情系川剧话兴衰 余荣邦(115)
5. 浅谈山城清音 杨忠全(124)

六、方志

1. 重庆城内以建置名的街巷 彭伯通(128)

七、资料

1. 批斗李井泉目击记 卢延辉(139)

周恩来陪都轶事

魏仲云

(一)

周恩来的《我的修养要则》

周恩来作风严谨,谦虚谨慎,严以律己,是人所共知,有口皆碑的。1943年3月5日(农历二月十三日)是他45周岁的生日。就在他生日的头天晚上,结合延安整风的精神,自我反省,提笔写了《我的修养要则》作为自己整风运动的自我检查和自己的“座右铭”。《要则》共七条: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和他人的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的坚决斗争。

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

六、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周恩来历来是不过生日,也不同意别人为他祝寿的,但同志们认为逢五,就避着他悄悄准备了几样茶点为他祝寿,他并不知道。

当天傍晚,曾家岩50号城里办事处的同志到红岩村来了,虎

头岩《新华日报》社的同志也陆陆续续的来了，救亡室的桌上摆着茶点。一无所知的周恩来走进来一看，一切都明白了。他当即表示不同意。他说：当此艰苦抗战，民族危亡的时期，唯有加倍努力工作才是，坚持不出席。大家只有按自己的安排，由徐冰和坤元二人先后致了祝寿词，同志们分尝了桌上的点心。晚饭时，难却同志们的盛情，周恩来吃了食堂煮的一碗寿面以示纪念，了却同志们的的心愿。

就在同志们聚会时，周恩来借自己的生日，认真严肃地反省自己，向同志们宣读了自己过45岁生日写的七条《修养要则》，并回顾和检查了自己旧世家出身所受的影响。据伍云甫日记的记载：周恩来谈到“养母20岁就守节，抚养他至10岁养母即去世，10岁前的教育完全受母教”“由于母教过分仁慈礼让，使自己也带几分女性的仁慈，看见杀狗杀其他牲就难过，缺乏一种顽强的斗争性。所以在党内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往往走向调和主义”。还自我检讨说自己“理论修养不够，有些事务主义作风。”

周恩来在过生日时，深刻反省检查，解剖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制订自我修养要则。同志们都被他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严以律己的高贵品质而深深感动。周恩来的45岁的生日，就是这样度过的。

（二）

周恩来“平坟还耕”

周恩来的老父周懋臣先生于1942年7月10日在化龙桥红岩村因病逝世。周恩来在父亲生病时，因前列腺炎复发住进了歌乐山中央医院手术治疗。当时正当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重庆白色恐怖严重。董必武和邓颖超等南方局领导同志为了让周恩来安心治疗，没有将他老父病重和逝世的消息让他知道。周恩来7月14日出院回红岩村才知老父已病逝三天，为未能同老父最后见上一面而悲恸万分。在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异常悲伤的写道：“出院后

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

当时，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处境和经费都十分紧张，无钱购置坟地，还是“红岩村”女主人饶国模女士得知后，慨然将小龙坎复元寺（现沙坪公园后侧）的一块土地捐出。周恩来将老父安葬。

周恩来总理的父亲周贻能，又名劭纲，字懋臣，生于公元1874年，早年随在衙门当师爷的父亲从浙江绍兴迁居江苏淮安，后家境衰落，常失业，只在衙门谋个小差事。光绪二十四年在淮安城附马巷老宅生一子，取名恩来，恩来满周岁时，其父幼弟贻淦病危而无子嗣，为了使弟弟有传人，让弟弟在弥留时得到点安慰，毅然将自己儿子恩来过继给弟弟。从此，恩来即由守寡的嗣母陈氏抚养，直到嗣母去世。周恩来除六岁时随父移居到清江县，与父亲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外，十二岁就到东北沈阳和天津靠伯父接济读书，后去日本留学，归国后投身革命，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但他对父亲仍感情很深，从日本归国曾专程回苏北看望父亲，对自己一生奔波远离故乡，南征北战，没有对穷困中的父亲尽孝常感内疚。抗战时期在重庆接见一外国记者时曾说过：“我已三十年未回过家，母亲坟前想已白杨萧萧，对父母我痛悔亲恩未报。”

周老先生秉性忠厚，性格开朗，一生在贫困中挣扎，只谋过一些小差事，在兄弟中算是无什么成就的。老人十分思念和关怀少年就离家的儿子。由于儿子是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在国内激烈的革命风暴中，不得不四处飘流躲避，直到1938年5月，儿子才派人找到他，接他到武汉。武汉失守前又转移到桂林，桂林吃紧，又转移到贵阳市郊青岩镇乡下居住。周恩来夫妇到了重庆，生活安定之后，一九四〇年秋才派袁超俊同志到贵阳将周老先生和岳母杨振德老太太接到化龙桥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周老先生在红岩村居住，受到儿子和儿媳的很好照顾和“八

办”同志们的敬重和关怀。周恩来夫妇不管怎么忙,都要抽时间看望老人,安排好老人的生活。毕竟是67岁高龄了,周老先生自一九四二年入夏后就患病,周恩来同志六月上旬生病入院治疗前,老人的病情并不严重,想不到七月初老人的病情恶化,七月十日在红岩村溘然辞世。患病期间,邓颖超同志常在病床前侍候。南方局的同志们多方设法请医生治疗。

周恩来同志出院回到红岩村得知老父逝世,异常悲痛,在老父灵前悲痛大哭,想到一年半之前,岳母在红岩村病逝时,他因公外出,岳母在咽气时未在身边;现老父去世自己又因病住院未能在老父弥留时见一面,老父一生颠沛贫困,未尽赡养之责和为人子之孝,亲恩未报,心中异常悲伤。正如在他给毛泽东主席电报中写道“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周老先生逝世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夫妇在重庆《新华日报》的广告栏内刊登了老父逝世的讣告。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四日上午,在红岩村为老人举行了简朴的悼念仪式后,当日下午,他们夫妇及重庆各界友好人士百多人扶灵柩到了小龙坎复元寺安葬了老人。墓前为周老先生立了一块墓碑。

1946年,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办”被迫撤离重庆。周老先生和邓母杨振德老太太的坟墓,直到重庆解放还保存下来。解放后,人们习惯称这座公墓为革命烈士墓,常有群众前来扫墓和瞻仰。重庆市人民政府也拟将公墓扩建为“革命公墓”,五十年代在渝去世的著名作家邵子南和老干部曹心哲(渝女师校长,曹荻秋市长之弟)等均安葬于此。

建国后,周总理日理万机,虽惦记着在重庆小龙坎的老父和岳母的坟墓,但一直未来过墓地。周总理一贯严以律己,严禁宣扬个人,尤其是自己的家族,在不少场合均以阶级观点批判态度,早在土改时期就将江苏淮安老家的房产捐给地方政府,生前一再制止有人提议为他设立“故居纪念馆”。

一九五七年二月，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访亚非 11 国回国路经重庆停留，在听取重庆市委市府领导谈到小龙坎老父和岳母的墓地称为革命公墓时，当即十分严肃指出：二位老人于抗战时期在红岩村去世，葬于小龙坎墓地，是我私人坟墓，一定不能称为革命公墓，如建公墓，我父和岳母的坟应从墓地移出，择地深埋。现在暂不动，等我与颖超同志商妥后再作处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中旬，总理特派国务院副秘书长童小鹏同志持给重庆市委、市府的亲笔信专程来重庆，信中对处理自己父亲和岳母坟墓提出：老人的坟已没有保存的必要，应平坟还耕，将所占的田土交还农村生产队，请采用深葬法，应选好深葬的地点，不应占用熟田熟土，所动用的费用和人员工资由我个人支付。还特别嘱咐：“不要张扬；不要兴师动众，注意影响。”市委遵照周总理指示，将任务交给了沙坪坝区委办理，十一月二十八日童小鹏同志来到沙坪坝区监督实施。区委指示区房管所所长张景智派施工员陈祥国组成十二人的移葬队，按照总理指示的不占熟田熟土，不留痕迹的指示，选定离墓地 70 多米的一块水田，将田里水放干，挖五米深的墓穴，二位老人遗骨从原墓穴中起出，火化后装入骨灰盒，放入移葬的墓穴，将原墓碑平放在骨灰盒上，再将墓穴四壁的石缝用水泥填缝，填平夯实后，然后放水，还原成水田，真正做到了深埋不留痕迹。最后，童小鹏同志按总理的要求将“平坟还耕”的实况拍成照片，拿回去给总理和邓大姐看。童小鹏同志按照房管所所长造具的花名单，用总理交的钱支付了移葬工人的工资、伙食费和全部费用。

由于按照总理的“不要兴师动众，要注意影响”的指示，参加移葬施工人员都不知移葬的是什么的坟墓，直到见了原墓碑才知是周总理的父亲和邓颖超同志母亲的墓。参加移葬的工人十分感动，感叹地说：“历代王朝和统治者为光宗耀祖，哪一个不为他们先人和自己大修陵寝。我们周总理可谓是‘一代名相’，一国至尊，对自己的老父和岳母的坟墓，不仅不让保留，而且深埋地下，平坟还

耕,自付工钱费用,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才做得到,真是人民的好总理啊!”

周总理平了老父和岳母的坟之后,1965年又写信给家乡的侄子周尔萃,并从邮局给江苏省淮安县城郊公社闸口大队第五生产的队长寄去人民币七十元,在汇款的附言栏内写着“此款支付生产队的平坟工资和赔偿青苗损失费”。淮安县委和闸口大队收到周总理的信:“国家耕地太少,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一种表现。平掉土坟,不但扩大耕地面积,也是破旧俗,立新风的一场革命,我要带个头。”总理要求将座落在闸口大队的周家祖坟全平掉,挖开深埋一米,寄七十元钱作平坟的工钱和赔偿青苗费。在侄子周尔萃的带领下,周家祖坟地变成了平整的种粮田,在当地产生广泛的影响,不少群众平坟还耕。

这是周恩来平了小龙坎复元寺父亲和岳母的老坟之后,又一次平祖坟,带头平坟还耕。充分体现了这位历史伟人的崇高的品德,广阔的胸襟。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的思想境界。从“平坟还耕”,使我们看到周恩来的伟大人格和从他身上体现出的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是周恩来伟大的人格和精神的集中体现。半个世纪过去了,周恩来的高贵品质,他的精神熏陶和感召着一代又一代人。弘扬红岩精神就要像周恩来那样做人,战斗、工作、学习。

吴玉章哭亡妻

魏仲云

老一辈革命家吴玉章，四川荣县人，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代表。1946年春，国民党蓄谋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政治局势急剧演变。党中央和南方局为应付时局的变化，决定在周恩来率代表团离开重庆后，成立公开的四川省委继承南方局留下的事业，在重庆继续开展统战工作，进行合法斗争。经中央批准，四川省委于1946年4月22日在重庆正式成立，4月30日，周恩来在中山三路263号中共代表团驻地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四川省委成立，并介绍省委书记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与记者见面。

吴玉章临危受命，顶着日益恶化的局势，留渝支撑着西南一隅的重任。随着国民党内战的步伐加快，重庆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吴玉章经请示中央，决定缩小组织，分批送一部份同志撤离回延安，他留下来顶住并作出最坏的打算。他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写道：“坚持到底，要保存这一敌后的堡垒。危险是危险，至多不过牺牲，我们不怕牺牲。”就在局势严重恶化的时刻，1946年10月24日从荣县老家传来爱妻游丙莲病故的消息。吴玉章怀着十分悲恸的心情，当晚提笔为亡妻写了一篇饱含挚爱深情的《哭吾妻游丙莲》祭文，述说自己身处险境，重任在身，不能回家为爱妻亲殓送葬的苦衷。祭文交由儿子震寰回老家代他在亡妻灵前宣读致祭。

吴玉章毕生为革命奔波，长期紧张的革命生涯，使他有家难归。他18岁时与表妹游丙莲成婚，伉俪情笃，相敬如宾。新婚后，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吴玉章离家外出读书，投身革命后长期颠

沛流离，三度出国去日本、法国、苏联，寻求拯救中国之路，学习马列，参加民主革命。离川出国前只回家住了一宿，与爱妻一别就是14年；1938年6月回川来重庆，曾回故里一次，在家同妻子也只团聚了3天，就接到中央发来的电报，立即赶赴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去了。后从延安到重庆，荣县离重庆近在咫尺，因环境所迫和公务在身也无暇回去，结婚50年，每隔一、二十年夫妻才得以见上一面，夫妻团聚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6年。自得知妻子染病卧床，也只能派儿子携带药品去护理，自己不能亲往探视，妻子弥留时也未能见上一面。惊悉爱妻病逝，吴玉章怎不痛心疾首、老泪纵横呢！

吴玉章为亡妻所写的祭文，句句血泪，字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祭文写道：“我哭丙莲，我们结婚五十年，我离你就有四十四年……满以为革命成功，将和你团聚乐享太平。料不到四十年来，中国革命迂回曲折……你既未能享受旧时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到新时代的光荣。今你别我而逝，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能不令人伤心！”“我哭丙莲……我参加革命，家中全赖你苦撑苦挣，由于你克勤克俭，使儿女得以成长，家庭免于贫困……使我这天涯海角之人得以安心。”“我本是一个革命家庭，我二哥为倒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悲愤自缢而牺牲，我大哥因大革命失败而牺牲，我四侄鸣和因土地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犹赖你能安慰寡嫂，团结侄辈，使家庭和顺。你待人忠厚，做事谨慎，使亲友称誉，你不愧为贤妻良母的典型。”“今年二月间你病重，我本想回家一省以慰你多年渴望之心。却因我公务羁身，环境所迫，不能如愿而行……不幸噩耗传来，你竟舍我而长逝，能不痛心！”祭文最后一段动情地写道：“亲爱的丙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不能哭，我不愿哭。因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牺牲得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益于事……国内民不聊生，内战烽火遍地，满目疮痍，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儿女为打倒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蒂，建成独立、自由、民

主、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以慰你在天之灵。两蓬，安息吧！”

吴玉章文情并茂，感人至深的祭文，一时在家乡荣县和重庆为人们所传颂。吴老怀着家国之痛，饱含对亡妻挚爱情深的悼念，对始终僻居乡间、勤劳操持家务的妻子的忠贞之情，读来哀婉感人。

红岩精神在老一辈革命家吴玉章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公而忘私，鞠躬尽瘁，把一生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吴老战斗在重庆的感人事迹很多，从他写给亡妻这篇祭文中，充分体现了他的奋斗奉献精神。

黎明前倒下的战士

朱 俊

彭立人(一九二三——一九四九)四川达县人。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重庆西南学院肄业。一九四八年奉组织之命回乡作农村工作,曾任中共达县特支书记,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在重庆被捕。十一月廿九日殉难于松林坡。

摘自《歌乐忠魂》

一九五三年夏,重庆市博物馆的前身西南博物院办公室收到了西南学院校董事会移交的一批档案。其中一封信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封信里装有牺牲在中美合作所的彭立人烈士的学籍档案,封面上写着这样一行字“彭立人烈士遗物。吴藻溪敬题。1953. 6. 20。”信封上还有“西南学院大学部土木工程系学生彭立人成绩袋”字样。吴藻溪,湖北人,当时任西南学院教务长,他早年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农学系,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参事。一九七九年病逝于上海。

彭立人,男,四川达县南赵家乡人,其父彭丰根是一位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乡村医生。一九三八年,日寇铁蹄横行华北、江苏、上海、内蒙等地,国事蜩螗令正在四川省第十五区联立中学读书的彭立人再也不能安静地坐在教室里了,他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在学校创办了《都来看》壁报和《余墨周刊》,大力宣传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他们还趁学校放暑假之时,组织了一个“抗日救亡宣传队”把宣传工作做到了广大农村。一九三九年,彭立人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二年秋,当重庆作为战时陪都遭到日本零式轰炸机的狂轰滥炸时,彭立人离开达县,考入重庆中华职业学校,在这所重庆地下党十分活跃的学校,他犹如鱼儿由山间小溪游入大河,展开在他眼前的是一幅更开阔的画卷,一方面是达官贵人醉生梦死,一方面是广大民众啼饥号寒,有为中华民族兴起奋起抗争的战士,也有为一己私利蝇营狗苟的儒夫。在这里,他还结识了地下党员、中国粮食公司的陈然,以及同一党小组的电力公司职员周显涛、曾福华等,在这样黑白分明的世界,在正义与邪恶的激烈冲突中,彭立人迅速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可以预料,这段时间的生活对他以后的人生选择将发生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九四五年,日军在中国大陆战场已开始了全面溃退,抗战胜利之日已指日可待,内战的阴云却时时出现在中国上空,为了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彭立人转入西南学院土木工程系学习,入学时,因囊中羞涩,几乎被拒之门外,幸好有个同乡王静如在重庆做小生意,这里有一张便条记录了这位先生的义举上面写着:

查学生彭立人欠下各费国(币)拾壹万元整,概由王静如先生负责担保限于本月底缴清故特请贵课先准予注册为荷 此致

注册课 范主任

三月十日

彭立人在西南学院大约读了近一年,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南方局根据党的“七大总路线”并结合当时形势,在大后方青年中发起了“革命青年到农村去”的运动。彭立人奉南方局青年组张黎群同志的指示,带领“川东农村工作队达县小组”,奔赴大竹、邻水、渠县、广安、岳池、营山、宣汉等地城市、乡村,广泛发动群众抗丁抗粮并密切配合华莹山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一九四七年,一支由中共达县特支书记彭立人率领的农民武装参加了“龙潭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上农军缺乏战斗经验,起义失败了。

一九四九年彭立人同志接到了新的任务，他告别了一起生活战斗了多年的战友回到重庆，继续活跃在大兴、木洞、朱家沱、相国寺、化龙桥等地的厂区和学校，从事“工运”和“学运”工作，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六月十二日，立人同志不幸被捕。先关在市中区枣子岚垭，不久又押至渣滓洞监狱，在狱中，他视死如归，虽受尽酷刑却绝不投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廿九日，彭立人、涂天应、单本善等卅二人，被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外号猩猩），管理组长徐贵林（外号猫头鹰）及大小特务十余人押往松林坡执行枪决，据说，当一颗美制汤姆式冲锋枪的子弹打中彭立人时，他两手伸向蓝天，仰面倒下，在草地上定格成一个“V”字。第二天，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重庆。

西南学院早已散消，彭立人烈士的这些档案是烈士留在世上不多的遗物，是联结昨天和今天的纽带。现珍藏于重庆市博物馆。

让红岩精神代代相传

罗达公

重庆二十九中充分利用山城这座英雄城市的丰富德育资源,让红岩英烈榜样的群体性,形象性发挥对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启动,导向和调控作用,带领学生开展创建红岩英烈班的活动,已历时十二年。红岩精神激励着一届届学生在“四有”的轨道上快速成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基础教育事业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崛起和迅猛发展,强烈地震撼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学校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重智轻德的偏向。二十九中党总支通过组织全校教职工学习、讨论、取得了共识:

淡化政治,重智轻德会使学校迷失方向;必须把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培育人才,铸造灵魂的基础工程来抓。

在新形势下,革命传统教育的内容和方式需要研究、改进和提高,要将其与爱国主义教育紧密结合,让沉默的历史开口,使山城的历史遗迹成为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和我们党光荣革命传统的窗口,让红岩英烈为国奉献的精神在青少年一代身上再现。

从1984年起,二十九中在“11.27”脱险志士郭德贤,刘德彬、孙重、杜文博的指导帮助下,以红岩村革命纪念馆和歌乐山烈士陵园为基地,带领学生开展创建红岩英烈班的活动,开始了探索新形